

思想的门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刘泽华
张分田等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思想的门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刘泽华 张分田等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刘泽华,张分田等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7

ISBN 7-80696-319-7

I. 思... II. 刘...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中国 IV. D0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867 号

思想的门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刘泽华 张分田等/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cbbs@yahoo.com.cn

天津市金铁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25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80696-319-7

定 价:34.00 元

前 言

本书由刘泽华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分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葛荃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荣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合作或分别撰写的十几篇文章组合而成。四位作者都是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既有宏观的思考,又有专题的讨论,大体可以覆盖本学科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基本方法和众多视角。其中有些思路具有学术创新意义。

本书几位作者都属于一个以刘泽华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为学术带头人的、规模较大的、跨学科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由四位博士生导师、数位教授和副教授组成,中青年骨干都有博士学位。他们长期合作共事,完成了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天津市项目和自选项目,编著并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系列教材,有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史方面的三十余部合作或独著的专著问世。这些研究成果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可谓独树一帜。其中刘泽华、张分田、葛荃等参与编写的《中华文化通志》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还被国家主席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国外著名大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获得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天津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还被译为朝鲜文在韩国出版;《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在海峡两岸由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

订本)》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材用书”。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历史现象的实证科学,又是一门现实感极强的学问。其最根本的学术特点是真实性和通观性,即通过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理性分析,探究原因、本质、趋势乃至规律,从以往的事例中得到启示,以判定现在的位置,推断未来的前景。这种从不可增删更改的既定事实出发,贯通昨天、今天、明天的思考方式是历史学所固有的,也是历史学具有永恒魅力的根本原因。求实、创新、致用,这六个字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座右铭。其中求实又是创新的基础、致用的条件。弄清事实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基础和最基本的任务。解释历史,评说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弄清事实,进而为人们提供可靠的知识和智慧。借鉴前车,判断趋势,更需要以真实的成败、盛衰、兴亡为前提。如果鄙薄求实,弃置实证,史说就会变成戏说。如果一个人有“宰割历史,为我所用”的心态,那么他就不成其为历史学者。一旦史学沦落为某些凭空设定的东西的注脚,它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对于“思想”的研究极易落入空疏和偏颇,甚至变成文本游戏,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脱离史实的赏析、望文生义的解读、无根无据的演绎。“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固不足取,从实证走向“实证主义”也无可称道,而脱离史实的“研究”和“历史注我”的“雄辩”则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严肃的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与社会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这应当是研究政治思想史最一般的原则与方法。

古往今来,国内域外,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宏论可谓多矣。一般说来,一切超越具体的学科领域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研究方法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大学科门类的重要研究方法,都可以用于认识与政治有关的精神现象,剖析历史上的政治学说,揭示政治思想的演变历程。这是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其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在形形色色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学科是最具包容性的。历者,过也;史者,事也。所谓历史,其本义即过去的事实。所有曾经发生的

事情,包括已经消失的和依然存续的,都是历史。凡是人类社会既往之事都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讲,一切社会科学门类实质上都属于历史科学范畴,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发生过或存在着的现象,它们的研究目的也都是为今天与未来提供启示。如果说各大学科门类有什么分工的话,那么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总体性地研究人类社会演变的历程,并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的各个层面给予整体性、综合性的解释,而其他学科的主要任务则是分别研究社会历史中的某一类现象或社会的某一层面,并对特定领域的研究对象给予专门化的解释。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照总体史和综合解释的历史学者更容易理解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弥散性及其彼此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与某些学科意识过于强烈或学术视野相对狭隘的政治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文化学者相比较,许多历史学者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往往更具有包容性,因而与事物的本来面貌也更接近一些。特定的学科分工与学术视野要求历史学者,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必须善于从社会科学各个门类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知识与智慧,进而把它们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和综合性解释。

在群雄割据的众多学科中,政治学科是最具“侵略性”的。这是由政治现象的弥散性所决定的。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自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来,政治就几乎无所不在。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政治关系居于中心地位,它影响、制约甚至支配着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政治现象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与哲学、宗教、道德、经济、法律、军事乃至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划分也只在相对意义上成立,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相分的界限。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很难找到属于单纯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社会实体。军事、法律、财政、外交等实际上都属于与国家权力直接相关的政治范畴。这就决定了在各种

观念形态中政治思想的“专门化”程度最低，因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相当宽泛。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哲学领域的“天人合一”、宗教领域的“政教合一”、道德领域的“内圣外王”、经济领域的“以农为本”、社会领域的“家国一体”、军事领域的“兵为王之本”、法律领域的“圣人王者立法”、文学领域的“文以载道”等，有的本身就是政治命题，有的主要是政治思想，有的与政治思想息息相关。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研究政治思想必须广泛借助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更何况学科的分类只是研究对象的区别，不是研究方法的畛域，一切有助于剖析特定研究对象的方法都可以采用。这就意味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应当把视野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即人类认识各种社会现象乃至自然现象所积累的所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凡是可以用于认识政治现象，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精神现象的，都应当毫不犹豫地拿来。这就是前人所说的“集千古之智”。

一般说来，学科应当从属于问题，方法应当适用于对象，理论应当服从于事实。浏览一下古今中外学术史，便不难发现：问题研究早于学科研究，学科分化缘于问题研究，许多新兴交叉学科也创始于问题研究。那些具有原创性思维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视角、思路、方法、理论都是问题研究的产物。实际上，划分学科的目的为了提高问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而不是将问题研究限定于某一个专门化领域。一些按照现行学科划分属于政治学的学者正在致力于“政治社会学”或“政治历史学”的研究。这种提法或多或少有自我限定的意味，然而它却提示人们：主观的学科划分最终还是要服从客观的问题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历史”，在本质上是不能以现行的学科划分来人为地加以肢解的。近年来，许多学者主张淡化学科意识，强化问题意识，这是颇有道理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每一种重大的政治思想现象的形成、传播和演化都与社会的众多领域、众多层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要

求“政治思想”的研究尤为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凡是志在有所创见的研究者都不应当被狭隘的学科意识遮蔽自己的学术视野，而要从“问题”出发选择课题，并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与特点来确定研究视角、思路与方法。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关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及具体对策的思考，所波及的领域相当宽泛，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所包纳的视角颇为众多。这不是一本小书所能容纳的，也不是几个断语所能概括的。任何唯我独尊、包打天下的心态都是愚蠢的。任何画地为牢、自我束缚的做法都是狭隘的。因此，本书无意于摆出堂堂之阵，更不试图构筑完整的体系，只是举其大端，略论一二，为读者开列若干可供学习、借鉴、参酌的思路和范例。

本书选编的文章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刘泽华教授治学历程的自述，旨在提示这样一个道理：学如聚沙积薪。成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当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素养、广角式的学术视野和综合性的研究能力。这需要在不断求索中逐步积累。第二类属于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政治文化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总体性论述。这部分内容是本学科方法论问题所必须涉及的。任何一部系统的教科书都要有这方面的内容。第三类是课题设计论证与实施方案，主要介绍几个专题研究的具体方法与基本思路。这部分文章旨在提供一些可资相互切磋、深入研讨的方法、对策和思路。有关的方法与对策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予以支撑，有关的思路都获得实证研究的检验，其可操作性、可借鉴性毋庸置疑。

史家面前无定论。见仁见智是学界常态。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学者们在对象把握、概念界定、方法运用等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和思路是很正常的。看问题的角度、方式有所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有差异。每一个学者在不断求索的过程中也会调整自己的观点。本书所收各篇文章的思考显然有各自的特点。有关的学术差异可以启发进一步的探索，大可不必强求统一。因此，在编辑此书时，基本保持了它们的原貌。这样一来，个别内容有些重复也就在

所难免了。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本书的四位作者不仅是论道者,而且是践行者。本书辑录的每一个个性化或专题性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思考都至少有一部相关的学术专著予以支撑。换句话说,有关的方法论思考都不是空泛无物的玄谈,更不是纸上谈兵,它们都被运用于研究实践,并出版了获得学术界好评的研究成果。这表明:本书所涉及的方法论都具有借鉴意义,有的甚至可以奉为典范。

在学术研究中,方法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网”可以比喻某种方法和工具。“鱼”可以比喻某种目的和成果。方法是否得当,工具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能够获得何种成果。方法贵在创新。结“网”捕“鱼”,必须借鉴前人,参酌现实,有所继承,有所发展。这样才能使得方法更合用,成果更丰硕。古人又有“得鱼忘筌”之说。“鱼”是目的,“筌”是工具。可以得“鱼”之“筌”是有用的。成功之后就忘记本来依靠的方法和工具,这样的“得鱼忘筌”固不足取。然而固执于一定的方法和工具,甚至自我限定,桎梏他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筌”是需要改进的,有时甚至需要放弃它而寻找更有效的工具。这样的“得鱼忘筌”颇有道理。

有鉴于此,我们既不排除经验之谈,又不拘泥一定之规。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是以探索的心态、尝试的方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展示成果,畅谈心得,其目的在于总结经验,启发来者,积极进取,开辟蹊径。我们希望这些成果与心得能够为进一步的学术创新提供一个平台与阶梯。

张分田
2006年1月

目 录

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1)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	刘泽华(14)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研究对象与方法	刘泽华 张分田(24)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方法	刘泽华 葛荃 刘刚(42)
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	刘泽华 葛荃(55)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的研究思路	刘泽华(71)
传统政治思维方式与行为轨迹	刘泽华(74)
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	刘泽华(78)
理性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思路	刘泽华(84)
开展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	刘泽华 张分田(87)
寻觅史家笔触	
——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刍议	葛 荃(102)
“以人为本”	
——关于“思想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葛 荃(118)
范疇史：中国思想史方法的探索	张荣明(125)
政治信仰和终极理念的研究方法	张荣明(129)
深入剖析统治思想的若干思路	张分田(143)
中国帝王观念研究的对象、思路与方法	张分田(145)
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张分田(207)

社会普遍意识研究的若干思路	张分田 (220)
附录一：“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241)
附录二：本书作者主要政治思想史专著简介	(254)
后记	(258)

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

1957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大跃进我被“跃”出来，当上了历史系的助教。1961年开始讲授中国古代史。1978年从助教越级升为副教授。我的经历实在有点蹊跷，本文难以细说。说到学业的成长我首先要感谢郑天挺、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巩绍英、魏宏运诸位先生，他们从各方面给我以指导和厚爱。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使我终生受益。比如郑先生指出要有两万张卡片方可写书、著文；又说，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这成了我终生的“立命方”。几十年来，看书必抄，从不敢放松。现在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抄的卡片，远远超过了他老人家号召的数字。下面谈谈我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有关的一些体会。

一、我选择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方向

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方向？

多年来我的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1984年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1987年出版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1991年出版了由我主编（也是主要作者，下同）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1992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另外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论文。

^{*} 本文原载于《学林春秋》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

回想起来,既有个人志趣,又有自我使命的选择。我上大学以前曾工作了六年,那时就对思想史有兴趣,在我书架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要属郭沫若 1956 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侯外庐等人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导,又没有受过科班教育,读这些书十分困难,但却十分有趣。1957 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 年留系工作。南开历史系的教授很多,也很强,但没有专事思想史这一行的。我向系负责人谈了我的志愿和想法,当即获得了支持,于是 1959 年我到中山大学从杨国荣教授进修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值饥饿时期,我第一次体会到读书可以“忘饥”。本想学两年,然而天不遂人愿,患了肺病,只好半途而归。在我治病期间,思想史著作又成了我的“良药”,留连其中忘却病魔缠身。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政治思想史被融入哲学史和大思想史之中;环顾学界,专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对这种现象有点奇怪,我虽没有找到说明这种现象的足够的理由,但也有一点模糊的感觉,好像是“政治”不需要它。可是自认为,从学科上说不能没有它,研究中国古代史是不能忽视思想史的,尤其不能忽视政治思想。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古代史的教学,但总不能忘怀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1964 年巩绍英先生来南开大学任教,讲授了半年“中国政治思想史”,我给他当了一个学期的助教,本以为有了归宿,可以追随巩先生专攻政治思想史。然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教学计划全被冲垮,政治思想史的课也被取消了。“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大泛滥给我以极大的刺激,为了清理自己,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下定决心,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令人悲伤的是,巩先生于 1973 年病逝,我只能靠自己摸索。

我是一个教书匠,研究必须与教学相配合。随着教学层次(本科、硕士、博士)的提高,我也力求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大致说来可分为递进性的三个层次。

政治思想史的基础研究:为了适应本科和硕士生,我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主编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为了给博士生提供一部完备的参考书,我与合作者写了较专深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

我把政治思想史的基础问题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人为单位的“列传”式研究；二是政治流派研究；三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潮研究；四是专题性问题的研究；五是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关系研究。在我看来，基础研究是一个学者终生的事业，越专越要回顾基础，如果在“专”的过程中不注意拓宽基础，容易漂浮和偏颇。

政治文化研究：在基础性研究过程中已涉及到普遍的社会政治意识问题，如何深入，多有困惑。适值 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方的“政治文化”理论开始介绍进来，于是我想到“传统政治文化”问题。人们对“政治文化”还众说纷纭，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我不想先给“传统政治文化”下什么定义，而是先从问题出发，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一是政治价值观念问题。所谓政治价值观念，指的是一种政治观念的文化结晶或凝固状态，如成俗性的政治心理定势，无明确意识的政治行为准则，无须论证的当然前提，不以为非的公认的政治形式、框框、套套等等。这些是历史长期积累的成规，是历史的惰性，在历史上影响极大，过去注意的比较少。我写了一些文章来剖析这些问题。二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问题。比如，儒家最初是诸子百家的一派，后来与政治结合为一体，这就有一个儒家政治化和政治儒家化问题。这一类问题在历史上同样有极大的影响。我曾搞过一个课题：“儒家与汉代社会的再整合”，就是试图把这个问题在历史层面上展开。

政治哲学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文化侧重社会政治价值研究，政治哲学则主要研究政治思维方式和形而上的抽象，政治哲学不仅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时会遇到，在研究中国整个历史时也会遇到。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最高抽象，同时又反过来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理论系统，而且在实际上它所起的控制作用有时可能比政治硬件还有效，因为它成为人们的精神规范和不可逾越的框框。我认为必须把政治哲学作为独立的领域来看待，这就需要从中国思想史中抽象出特有的政治哲学命题、范畴，要研究我们祖宗的政治思维方式。虽然至今我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但大体说来是沿着以下几点进

行探索的:其一,哲学史中最高、最抽象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哲学问题;如果讲中国哲学的特点,正在于是“政治哲学”,或者说哲学问题都要归结为政治问题。其二,从中国的历史过程解析中国传统政治精神的主旨问题,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政治精神的主旨是王权主义。其三,传统政治思想和观念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理论上的“混沌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阴阳结构”,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剖析这种“结构”的组合特点。其四,研究传统政治思维方式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两书中已有所论述,也写了若干篇文章,但只是开了一个头。目前我与合作者正集中力量写一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一步系统论述这些问题。

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但愿这一判断离历史的实际不太远!

二、对中国古代社会运行机制的看法:王权支配社会

我身在历史系,不能只限于政治思想史,还必须研究通史。我主持编撰过《中国古代史》。由我主编并作为主要作者之一的著作还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士人与社会》(包括“先秦卷”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在通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逐步形成如下的看法:应把社会形态与社会运行机制适当区分开来,后者应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来研究。马克思在谈到法国中世纪的特点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句话对我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我稍加变通,把“行政权力”变成“王权”二字。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

从历史的总过程看,我仍相信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这是最基础性的看法,王权支配社会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要回答这个社会何以是这样,后者则是回答这个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区分这两个不同层

次对更真实地把握历史过程是有意义的。

社会的运动主要是受日常的社会利益关系矛盾驱动的。社会利益问题无疑有许多内容,但主要的还是经济利益。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这样政治权力就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停地变动,而其结构却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的问题就是以此为依据而提出的。

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所谓“马上得天下”是也;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思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更为具体,更便当。

王权主义是上述现象的总称,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一切权力机构都

是王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其二,王的权力是至上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王的权位是终生的和世袭的。其三,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六合之内,人事万物,都属于王权支配对象;或者说,王权的无限并不是说它包揽一切,而是说,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所谓“不事王事”,但不能逃脱它。其四,王是全能的,统天、地、人为一体,所谓的“大一统”是也。

在王权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体系。王权无须经过任何中介,直接凭借武力便可以拥有与支配“天下”,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子以四海为家”;“土地,王者之所有”等等,这些话并不是虚拟之词,而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政治统治权和对土地与人民的最高占有、支配权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这样说,对土地和人身都是混合性的多级所有,王则居于所有权之巅。这种观念和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有时是“虚”的,但它随时可以转化为“实”,“虚”“实”结合,以“虚”统“实”。因此权力的组合与分配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财产、社会地位的组组合与分配过程。王权——贵族、官僚系统既是政治系统,又是一种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利益系统,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这个系统及其成员主要通过权力或强力控制、占有、支配大部分土地、人民和社会财富。土地集中的方式,主要不是“地租地产化”,而是“权力地产化”。这个系统在社会整个结构系统中居于主要地位,其他系统都要受它的支配和制约。

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

我们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思想家几乎都在为王尊编织各种各样的理论,并把历史命运和开太平的使命托付给王。天、道、圣、王合一(简称“四合一”),置王于绝对之尊。“四合一”是传统思想中的普遍性命题,只要是称得上思想家的,几乎没有不论述“四合一”的。如何“合一”,固然有种种说法和理论,但所追求的都是“四合一”。关于这